

手术告知：医患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李 敏

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京西分院,一病人家属拒签手术通知单致母子双亡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怀有身孕的妻子被丈夫送入医院时,被医院诊断为“孕足月、重症肺炎、急性呼吸衰竭、急性心功能衰竭”,需要立即进行剖腹产手术。由于情况紧急,医院启动应急绿色通道,同意对其进行减免费用入院,并组织多名医护人员待守,等患者家属签字后手术。在医护人员和其他家属苦求下,丈夫仍在手术通知单上写道:“拒绝剖腹产手术生孩子,后果自负。”而由于当时有“如果家属不签字,不得进行手术”的规定,尽管医院对病人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但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大多数人认为,手术知情同意书是医生推脱责任的一种形式,是医生的免责书。其实不然,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路桥医院医务科副科长褚江洪告诉记者,手术知情同意书首先是向病人解释病情和医生要怎么做,从行政管理角度讲,它是医疗机构履行告知义务的一种法律形式,同时也是患者和患者家属行使同意权的一种法律形式。

医患双方彼此尊重

手术知情同意书涵盖了术前诊断、可选择的诊疗方案、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意外和风险、手术后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并发症、拟实施手术名称、医患双方签字等方面的内容。

“术前沟通是手术前的必要环节,手术知情同意书从内容上肯定要满足患者做出选择所必须的信息。”褚江洪介绍说,基于这个标准,患者才能准确、及时、完整地了解术中、术后的风险以及对病人会产生哪些影响。当然,手术前,医生要与患者、患者家属进行沟通,详细地讲解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的内容,共同探讨具体需要实施哪一种诊疗方案。一定程度上讲,签字是医院对患者就医权的尊重,是患者对医生从业资质的认可,需要医患双方互相信任。

医学是一门科学,由于科学的探索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领域,每个人对科学的认识也都不一样,医学在进步,但再进步的医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褚江洪认为,一份简单的告知书并不是医生的免责书,更多意义上来说,是对医生的约束。

术前拒绝签字的案例在路桥医院很少发生,而拒绝签字的患者家属大多以为术前签字是医院的霸王条款,任医生如何苦口婆心,坚持不签。医患双方在告知的认可方面存在着问题,如何缓解这一情况呢?“还是那两个字——尊重。”褚江洪再次强调,“患者对医生的尊重,医生对患者、对疾病本身的尊重。”他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原则,不论患者或患者家属有没

有对同意书签字,当病人需要急救的时候,医生应该施以援手。另一方面,患者或患者家属不能因为害怕未知的风险而拒绝签字。

随时随地无隐瞒

患者在就医时,告知是医生的义务,也是患者的权力。

有时,医生在尊重患者(家属)的情况下会做保护性地不告知,“比如说,恶性肿瘤,有些家属会要求我们不要告诉患者。或者,患者得知病情后要求不要告诉家人。”褚江洪说,这种要求不告知的情况很多,医生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答应。

如没有特殊要求,告知是随时随地的。病情进展需要第一时间告知患者,让患者及时了解情况,减少不安的心理。

由于医学的不确定性,手术时,经常会出现手术前未预知的情况。此时,手术室内的医护人员会随时告知等候在外面的家属手术中出现的状况。

“手术方案在手术前都是定了的,要是手术中有情况告知家属,会不会引起家属的恐慌?”记者问。“不会,这反而是缓解恐慌的方法。患者进了手术室后,如果原本计划是一个小时,手术中出现了突发情况,手术时间延长,等候在手术室外的家属肯定很紧张。这时,有医生告知其手术时都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或变更了治疗方案,家属内心会稍微缓和一点。”

对于“告知”而出现的医疗纠纷,褚江洪表示很是无奈,“患者选择医生说明是对医生还是信任的,医生的出发点都是极其想给病人一个完美的治疗方案。患者的感谢是医生成就感的最大来源,医治成功的案例大大高于失败的案例。医患之间的沟通要基于信任,而不是互推责任。”



图片来自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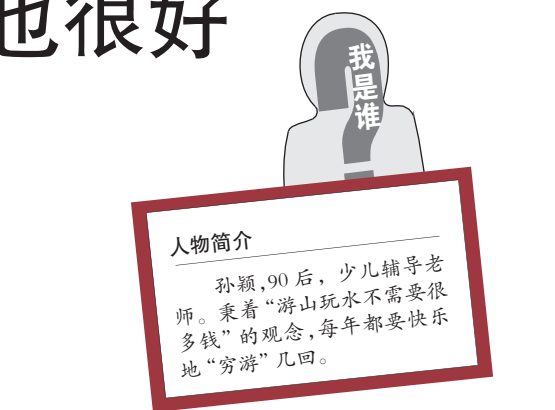
“穷游”的滋味也很好

□孙 颖 / 口述 梁亦慰 / 整理

“好想出去玩啊,可是我没多少钱。等发财了,我一定要将祖国每个角落都走遍!”平日一提到旅游这个话题,几个朋友就开始感叹。不出去玩,无非两个理由,要么没时间,要么钱不够。于是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感叹中,对着电脑和游戏机发霉,一年的时间耗费了,还是哪儿也没去成。

出去玩,就一定得花上好几千才行么?对我来说,“穷游”也很有滋味。所谓“穷游”,当然指资金少,花销小。个人觉得,这个“穷”不是指极度的抠门,而是旅行途中,在可以节省的地方把资金压缩掉,以最大的性价比来愉快地游玩。

还在杭州上大学的时候,我带着小伙伴,以 700 元的资金,到西塘玩了三天两夜。虽然只用 700 元,实际上,



我一点儿也没亏待自己,吃得好睡得好,拍了一摞美丽的风景照,收获了格外美好的回忆。去西塘前,我做了充足的调查,除了锁定便宜且舒适的客栈外,还将那边值得玩、值得吃的地点列成一张表格。所以,当其他游客在景区里昂贵又不好吃的饭馆里用餐时,我和室友在附近的一家小店里,心满意足地享受着美味实惠的特色小吃。当别人花 300 元甚至更多的钱在一家口碑不怎么样的旅店登记入住时,我早已住进 100 元左右,干净舒适还带早餐的青年旅社,拉着热情的老板娘一起打上了麻将。

虽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听起来很酷,但真操作起来,说走就走反而会带来麻烦,让人花冤枉钱。我的表兄,在节假日突发奇想,兴冲冲开车去某景点玩,到了那边他才发现,门票超贵的景区不仅逛起来索然无味,在人山人海里挤着也很不舒服。后来,除了高级酒店,他在其他旅馆订不到房间,那趟旅行成了名副其实的“花钱买罪受”。

来一场成功的“穷游”,出发前不研究目的地,不掌握节省的信息是大忌。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成为专家,只要借助网络的平台,从各个旅游者发布的帖子里掌握需要的信息,做足功课就可以大胆迈出“穷游”的脚步。毕竟,借助网络查资料,勤快地多问几个有经验的前辈都不是什么麻烦事,策划“穷游”方案其实很 easy (容易)。

趁着有时间,去“穷游”吧,抛弃旅行团,不在大部队的簇拥下,走马观花地穿梭于多个景点。不用去人多拥挤的名胜古迹,不住豪华的五星级大酒店,不惦记满是山珍海味的大餐,只背上简单的行囊,清爽上路,这样的自由与钱无关。



学生时代的抗日救亡斗争

□本报记者 项 懿

台州中学从前身三台书院(1867年)到三台中学堂(1902年),再到省立第六中学(1912年),直至1935年更名为台州中学,一代代薪火相传。罗天治也正是在1935年考取了这所台州最高学府——台州中学简易师范部。

所谓“没铜板,读师范”,师范部的学生大多来自贫寒家庭。不过穷则思变,师范部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学习特别勤奋,全校各科会考师范部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且特别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毕业生有着很大的理想抱负,几位首届毕业生还奔赴仙居,在穷乡僻壤的山村办起了“儿童乡村学园”,对分散的牧童进行义务教育。罗天治也为自己毕业后能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而感到自豪。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罗天治的命运轨迹。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影响和推动着海门的爱国人士和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但由于当时海门党组织尚未恢复,因此抗日气氛不浓,四处传言“日本人马上就要登陆海门”,人心惶惶。同年9月5日,日寇出动9架飞机,对海门进行狂轰滥炸,炸死炸伤无辜民众百余人,激起了民众满腔怒火。海门各界人民不顾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重重限制和阻挠,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

此间,海门东山中学校长林尧和林泗斋受粟裕(中国现代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邀请,赴温州平阳山门红军闽浙边军区司令部,向他汇报海门及东山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并了解了当前抗日形势和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他俩回校后立马研究决定在青年学生中发展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简称民先),为党培养革命后备力量。当时,台州临时工委同样在台州中学发展民先队员,并让罗天治担任学校民先组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学校控制严格,他们的活动多半采取隐蔽分散的方式,轮流去东山中学参加各种活动。每周的一场讲座就是其中之一,主要向学生和老百姓讲“首战平型关”、“西安事变”、“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等故事。

东山中学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还对学校课程作了大胆的改革,废除旧课,增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还有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及国际时事等。罗天治他们除了经常旁听以上课程外,还到椒江书店购买或借阅进步书籍,尤其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些书籍使得这些青年学生对共产党、工农红军、八路军及新四军有了一个大体了解,这也成为罗天治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课程。

1938年的“五一”劳动节,台州中学师生联合海门各救亡团体,进行抗日救亡演出。演出中一位童子军教员被台州专员公署的副官带走,罗天治上台说明发生的事情,宣布停演,随后立即宣布回校召开民先小组会议,决定在全校发动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数百名学生手执小旗,高呼口号,向台州专员公署进发,在这种形势下,专员要求谈判。罗天治他们提出了3个条件:释放被抓的童子军教员;要求专员向全体师生赔礼道歉;并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工作。谈判取得了成功,这一事件打开了台州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的局面。

不过,这次斗争也引起了学校当局的恐惧,他们调查学生中的抗日进步分子,搜集师生中的进步书刊。台中的教导主任劝导罗天治读书救国,不要参加政治活动等,罗天治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他们,结果被校长在大会上点名训斥。

1938年11月,海门发生了一起震惊台州的“反奸奸运米资敌斗争”。临海县长台州代理专员张翰庭妄图将10万多包大米偷运到上海资敌。原计划从温岭或金清装船出海,由于我地下党及时发现,发动群众阻止。张翰庭阴谋无法得逞时,雇来葡萄牙货轮“神福号”驶至海门码头停泊,将大米运至海门,准备装船起运,还派了100多名武装军警沿途押运。此时被中共海黄特委委员获悉,他们立即分头到学校、居民和附近乡村发动群众,揭露其运米资敌阴谋。消息顿时传遍了海门每个角落,当时的《火炬报》对此进行报道,并将报纸张贴在大街及交通要道上,群众看后无不义愤填膺。同时,海黄特委委员通知罗天治以台中国民先队为骨干,发动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示威。罗天治立即在校内进行发动,大米运到之日,海门群众倾巢而出,几千人云集码头。妇女居前,儿童老人紧随其后。码头工人是这次斗争的主力,他们手持剪刀、菜刀、棍棒,见米包就划,见麻袋就戳,致使岸上大米包全部破漏没法装船。押运军警慑于群众震怒,不敢贸然开枪。斗争相持了3天,“神福轮”最后不得不灰溜溜地开走了。

但以张翰庭为首的台州当局和台州中学的校长极为恐慌,他们把进步学生看成眼中钉、肉中刺。1938年12月初,东山中学被勒令停办。中共台州特委指示海门支部一定要保护好进步学生力量,并决定向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输送一批骨干。罗天治被通知负责带领海门、临海、天台各县15名进步青年,奔赴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

(未完待续)